

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新探

葛晓音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利用考试取士的机会对当时学者以“险怪奇涩”相尚的文风痛加排抑,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四朝国史·欧阳修传》)。这是他所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关于欧阳修所打击的文风究竟是西崑体骈文,还是属于古文运动中的不良倾向,曾枣庄同志最近在《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一文(载《文学评论》一九八二年第五期)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辨析,认为欧阳修所排斥的是号称“太学体”的古文,从而初步澄清了学术界历来在这个问题上含混不一的说法,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曾文认为当时古文生涩以宋祁为代表,狂怪以杜默为代表,则仍未完全弄清太学体产生的具体背景和直接原因,因而有值得商榷之处。要搞清“太学体”为何以“太学”为名,就应当具体考察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之前流行于太学的文风。宋祁虽曾两次在国子监任职,但第一次在天圣初,第二次在宝元中,当时太学尚未创建^①,因此看不出他与太学体的直接关系。杜默早年为石介门人,其诗歌之怪不但为苏轼所嘲笑,也受到过欧阳修的批评,但如据此断定其古文为狂怪代表,证据似嫌不足。我认为所谓“太学体”,主要是指庆历中以来,因石介、孙复、胡瑗等在太学复古过当所造成的流弊。进一步搞清其流行的时间、背景和原因,对于透彻理解欧阳修的诗文革新理论、甚至重新评价他排抑太学体的意义,都是十分必要的。

“太学体”的流行,当从仁宗庆历中创建太学起到嘉祐二年止,大约有十三、四年的时间。范仲淹等实行新政时,意欲复古复学,庆历四年,始“建太学于京师”(见欧阳修《胡先生墓表》),并规定“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赋”(《宋史·选举志》)。从此太学就成为求仕的必经之途。从庆历四年到嘉祐初,太学最有影响、生徒最多的学官是石介(字守道,号徂徕)、孙复(字明复,号泰山)、胡瑗(字翼之,号安定)三人。欧阳修在胡瑗墓表中说:“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唯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胡瑗少时在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十年,三人都精于道德经术,学术宗旨大抵相同^②。孙复至和年到嘉祐初在太学为国子监直讲,嘉祐二年七月以疾卒于家。石介一生以教学自任,“及在太学,益以师道自居,门人弟子从之者甚众,太学之兴,自先生始”(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他虽在庆历五年即负谤而死,但影响很大,其弟子“常续最高第,骞游各名科”(欧阳修《读徂徕集》)。胡瑗早先在湖州教学,就有弟子数百人。庆历四年朝廷取胡瑗的教学法为太学法,皇祐末胡瑗才来太学任教,四方学者慕名而来,以至太学容纳不下,“礼部贡举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胡先生墓表》)。胡瑗死于嘉祐四年,欧阳修打击太学体之时,正是胡瑗在太学极享盛名之际。仅从石介、胡瑗弟子大都在科举中列入高第的盛况也可以看出:太学建立以后,科场考试标准已自杨、刘讲求声病偶对的时文转为便于阐发经义的古文。宋初以来,取士标准一般是先诗赋后策论,到天圣八年欧阳修赴

进士试时，所作的还是“移此俪彼，以为浮薄”（《与荆南乐秀才书》）的杨、刘时文。天圣中，仁宗下诏敕学者去浮华，宝元以后风气渐变，考试次序改为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庆历时改为三场：“先策，后论，次诗赋，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宋史·选举志》）于是策论经义的重要性就超过了诗赋。庆历五年新政失败后，虽然仁宗曾一度下诏罢去入学日限，恢复科举旧条，“以为诗赋声病易考”，但从《选举志》所载张方平、王珪的奏议来看，“进士明经先经义而后试策”的章程并未改变。据《宋会要辑稿》卷一〇六四一，张方平庆历六年知贡举，王珪皇祐五年知贡举^③（距嘉祐二年仅四年），可知从庆历到嘉祐十多年间，科场考试基本上以经义试策为主，便于述经的古文也就因此大行于世。所以欧阳修说：“伏见国家自兴建学校以来，天下学者日盛，务通经术，多作古文。”（嘉祐二年《条约举人怀挟文字劄子》）石介等三位道学先生之所以能入主太学，倡道复古，并使生徒皆以古文得显仕，与统治者改革政治的需要和科举取士标准的变化是密切有关的。

庆历之学对于复古明道、革除西崑体的浮艳之风固然有功，但由于太学成为贡举求仕的主要门径，诸生为猎取声名，往往喜尚标新立异，其文章内容大都流于迂阔诡激，文辞多追求险怪僻涩。欧阳修在嘉祐二年所写的《议学状》中对这种流弊产生的原因分析得极为透彻：“夫人之材行，若不因临事而见，则守常循理，无异众人。苟欲异众则必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谈虚论以求材识之誉，前日庆历之学，其弊是也。”吴充《欧阳公行状》说嘉祐初欧阳修将“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几尽”，既然此时怪僻仍可列入高第，足见庆历之学尚怪的风气到嘉祐初依然盛行。这种学风因“喜声名”（《宋史·石介传》）的石介而兴，至嘉祐前由孙复、胡瑗接管太学时并未稍减。尽管欧阳修对这三人复古的功绩向来推崇备至，但是从欧阳修同石介及其弟子的通信和诗歌往来中仍可看出，他与太学先生们的复古主张有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言行上，主要是欧阳修提倡守常循理，而石介等则追求自异于众。早在石介为郢州观察推官时，欧阳修就看出他有好怪自异的倾向。他在《与石推官第一书》中批评石介所作的手书和二象记石本：“何怪之甚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学舍，以教人为师，而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今不急止，则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归，此修所以为忧而敢告也。”可惜石介以为欧阳修只是在责怪他的书法，于是欧阳修又写了《与石推官第二书》，强调“凡仆之所陈者，非论书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异以惑后生也。……仆岂区区劝足下以学书者乎？”“太学体”的出现证明了欧阳修的远见。书体之怪，只是石介以怪求名的方式之一。此风一开，很快就被太学生发展到更加迂僻的程度。关于这方面的史料虽不完备，但仅从黄宗羲《宋元学案》收集的记载中也可窥见当时风气之一斑。如石介最得意的门人何群曾“请复古衣冠”以自标榜，“徂徕赞美其说”。胡瑗的弟子也都好在衣服容止上特异于众人，“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胡瑗的高足徐积还仿照见贵官的礼仪，“裹幞头，服公裳，晨省其母，外氏诸妇大笑之，先生弥恪，久而不复笑也”。与这种迂怪言行相应的是其文风的怪僻，所以《东坡志林》说仲车（徐积字）“诗文则怪而放，如玉川子”。何群门人冯正符（孙复三传弟子）能“辨何氏三科九旨之穿凿怪妄，最为详悉”（以上引文均见《宋元学案》）。据欧阳发所著《欧阳修行状》载，当时考场文字之怪，甚至有“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语，怪诞如周公佻图、禹操舂舂、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欧阳修虽然提倡复古明道，但他主张“读书趋简要，言说去杂冗”（《送焦千之秀才》）。因此他针对太学怪风，借对樊宗师的批评指出：以怪奇矫浮薄的复古之道并不能得韩愈的真传：“异哉樊子怪可吁，必欲独出元古初。穷荒搜幽入有无，一语

请曲百盘行。……忌世狡巧习卑污，以奇矫薄骇群愚。用此犹得追韩徒，我思其人为踣踣，作诗聊譴为坐媿。”（《绛守居园池》）

欧阳修痛黜太学体，还不仅是因为这种怪僻生涩的文风不合他喜尚平淡简要的趣味，更重要的是其内容的迂阔诡激与他“研穷六经之旨”必须“究切当世之务”（《答陆伸》）的一贯主张相悖。苏轼后来在《议学校贡举状》一文中指出：“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政事之间乎？”^④措论求深而至于迂，动辄唐尧虞舜，不切时务，确是太学诸生的通病。如《宋元学案》载神宗闻孙复门人姜潜贤，向他访求治世之道，姜潜却回答：“有尧舜二典在，顾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胡瑗门人张坚经常对诸弟子传授“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空洞大道理。胡瑗的另一位高足田述古“读书唯易、中庸、论语、孟子，间及老子、扬子，申重熟复，造其深旨，余不措意也”。所以欧阳修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批评张文：“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并指出“今学者……乃乐诞者之言，思混沌于古初”，“而务高远之为胜，以广诞无用之说，是非学者之所尽心也。”又在《送黎生下第还蜀》一诗中告诫黎生：“圣言简且直，慎勿迂其求。”有迂阔的高谈虚论就必有诡激的诋时之说。欧阳修曾婉言责备石介文章“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与石推官第一书》），而石介这种偏激之词又为他的门人发展成诡激矫诞之说。如何群“喜激扬论义”，曾上书说“后世专以文辞，莫甚于赋，请罢去”，得到石介赞同，而他自己的赋却“既多且工”，因而被人指为“不情”（见《宋元学案》）。正因为迂阔矫诞的高谈无补于时，所以欧阳修在排抑太学体的同时，大力推荐三苏父子“精于物理”、“善识变权”、“辞辩宏伟”的“有用之言”（《荐布衣苏洵状》），又于嘉祐二年两次上书请召陈烈为太学先生，因“其学行高古，然非矫激之士”（《荐布衣陈烈充学官劄子》），并请求“悉取九经之疏，删去讖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讖纬劄子》），在诗歌方面则要求“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吴充《欧阳公行状》），这与他主张作文务为有用之说的意见是相通的。所以欧阳修对石介在太学每日里“陈诗颂圣德”、“唐虞虞咏歌”（《读徂徕集》）的做法颇有微词，这一点可以从他写于康定元年的《赠杜默》一诗得到证明。这首诗说石介弟子杜默“作诗几百篇”，颇受石介赏识，但“携之入京邑”后，却遭到欧阳修的讽刺：“岂如子之辞，铿鍠间铺笙。淫哇俗所乐，百鸟徒嚶嚶”，致使“杜子卷舌”而去。诗的结尾劝杜生应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京东聚群盗，河北点新兵。饥荒与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发声通下情。上闻天子聪，次使宰相听。何必九包禽，始能瑞尧庭。子诗何时作，我耳久已倾。”显然，这些论诗主张与石介及其弟子一味歌功颂德的诗风是大相径庭的。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欧阳修从庆历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扭转由太学流行到社会上的迂怪僻涩的文风，只是到嘉祐二年时才有机会利用知贡举的权力来一次彻底的扫荡罢了。曾枣庄同志由于没有完全弄清欧阳修排抑太学体的背景，因而对这次知贡举的意义的评价也和各家文学史论著一样，仍然局限在改革散文的形式风格方面。从以上考辨可以看出，这次斗争的意义不只是使文风由怪变易，从此建立起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散文风格，而且还有力地扭转了古文复兴之后脱离社会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

在西崑体遭到复古运动打击之后，欧阳修大力排斥太学体的斗争，对于保证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彻底胜利，具有关键的作用。西崑体流行四十年，到仁宗天圣以后已趋于衰微，经过柳开、穆修、石介、孙复、欧阳修、尹洙、苏舜钦、梅尧臣等人提倡尊韩明道，庆历之后，古文已代西崑体而起，风行于文坛。这些古文家虽然在反西崑体的斗争中方向一致，但对

于“明道”各有不同的理解。欧阳修重在简易致用，石介等却以怪僻求名；欧阳修倡道为改革现实政治服务，石介等则流于空谈甚至复古倒退。这场斗争在文学上促使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避免了重蹈中唐古文运动的覆辙。晚唐的浮靡文风之所以能够复兴，当然有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唐国史补》）的风气终于使古文自行衰亡，也是中唐古文运动未能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苏轼在《谢欧阳内翰启》中批判太学体的迂怪文风时，特别指出：“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孙樵以降，无足观矣。”皇甫湜、孙樵片面发展了韩文新奇险怪的一面，最后使晚唐古文无足观，正与石介尚怪终于使太学体古文无足观的情况相似。历史的教训引起了欧、苏的警惕，使他们认识到：虽然古文家和“学者未始不为道”，但如果溺于文字，“甚者至弃百事”（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就不可能达到明道的目的。欧阳修及时打击了这股歪风，并提拔出三苏、王安石、曾巩等一批“博于古而宜于今”（《荐布衣苏洵状》）的古文家，使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不但后继有人，而且更加发扬光大。因此这场排抑太学体的斗争与反对西崑体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应当在中国文学史论著中补书一笔。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注：

① 宋代“凡学皆隶国子监”（《宋史·选举志》）。据《宋史·宋祁传》载，宋祁于天圣初与兄宋庠同举进士，释褐时为孙奭所荐，改国子监直讲。后宋庠“方参知政事”时，宋祁又“判太常礼院、国子监”，不久又改判太常寺。据《宋庠传》，宋庠“方参知政事”是在宝元中。此后宋祁再也不曾担任过国子监的职务。但太学创建于庆历四年，已是在宋祁第二次判国子监以后七、八年的事了。

② 参见黄宗羲《宋元学案》所引胡瑗传。先文洁说：“本朝理学实自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三先生始。”

③ 此后王珪多次知贡举，但本文所引奏议在《宋史·选举志》中列在庆历六年后，嘉祐二年前，当是他在皇祐五年知贡举时所上。

④ 欧阳修对孙复、石介二人的评价略有区别。他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并序》中说孙复“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认为孙复在治经中能破除当时众家说经“怪迂百出杂伪真”的迷雾，是有功绩的。